

论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思想对 罗莎·卢森堡的影响

林浩超/文

[提 要] 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革命唯心主义的精神特质,认为知识分子才是革命的主体,无产阶级单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接受掌握理智和科学的知识分子的领导。罗莎·卢森堡吸收了拉萨尔的革命唯心主义,特别强调由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党对无产阶级群众的思想灌输,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成败取决于党能否发挥领导作用。卢森堡对拉萨尔思想的青睐,是第二国际理论界一个普遍现象的反映。这一现象的产生是出于与改良主义进行论战、回应欧洲工人运动新问题的需要,也说明了第二国际理论家没能正确把握无产阶级运动与资本主义的崩溃、社会主义的产生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

[关键词] 罗莎·卢森堡 拉萨尔 革命唯心主义 辩证法 工人运动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是第二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革命家,她不仅以艰辛的理论探索推进了帝国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把自己的宝贵生命献给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但与此同时,她也是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思想的忠实信徒。1907年,卢森堡在写给克斯特亚·蔡特金(Kostja Zetkin)的信中热情地说道“我很高兴你如此欣赏拉萨尔的思想。我也为之疯狂。我坚决捍卫这一思想。他对我影响很大,促使我认真研究劳动和科学。他的思想是活跃的、

天才的。马克思更加宏大、深刻,但远不如拉萨尔那么灵动、丰富。”^①卢森堡不仅赞同拉萨尔的思想,而且试图用拉萨尔主义去填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与拉萨尔主义结合起来的做法,在不少理论家看来似乎合情合理,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与拉萨尔主义本身就是一致的。比如,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在其著作《国家制度和

^① Rosa Luxemburg *Gesammelte Briefe*, Band 2, Berlin: Dietz Verlag, 1982, p. 308.

无政府状态》中就认为“拉萨尔的纲领与他承认是自己导师的马克思的纲领毫无区别”^①；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也相信,拉萨尔只是“用不同的话表达了同马克思相同的或差不多相同的意思”^②。然而,这样的观点和做法完全无视了如下事实,即马克思本人曾多次指责拉萨尔对自己理论的剽窃和歪曲,并且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拉萨尔主义进行过无情批判。将拉萨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强行结合起来,显然会模糊二者的根本分歧。本文认为,卢森堡用拉萨尔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与上述认为拉萨尔与马克思根本一致的观点一样,都是以忽视二者的距离和区别为前提的。鉴于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突出贡献,以及她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中的重要地位,我们有必要批判地研究拉萨尔思想对她影响,重新拉开拉萨尔革命唯心主义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差距,澄清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以此向上述观点和做法提出质疑。

一、拉萨尔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特质及其主张

我们可以将拉萨尔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特质称为革命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不是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寻找无产阶级运动的可能性和依据,而是极力强调思想的力量,认为只有把思想注入现实,才能推动革命的运动并实现社会主义。这种革命唯心主义贯穿于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思想中,以“铁的工资规律”理论为前提,以强调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为核心,并且表现在国家建立合作社和争取直接普选权的具体主张中。

“铁的工资规律”理论是拉萨尔革命唯心主义的前提。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就是指工人的工资在任何时候都只能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

要的生活水平上”^③。因为工资的任何上升都将造成劳动人口增加,使得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进而加剧工人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工资水平回落。拉萨尔认为,违背“铁的工资规律”是造成工人不幸的根本原因。但是,“铁的工资规律”理论所立足的基础,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经由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改造了的供求关系学说。拉萨尔在宣布发现这一“规律”时,根本没有进一步考察供求关系背后依托的历史条件、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反而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下,把工资问题理解为自然界物竞天择的生存法则在社会领域的简单反映或运用。美国学者拉雅·杜娜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曾经指出,拉萨尔“无法从自己的头脑中清除‘劳动的落后性’的概念”^④。通过把工资水平这样的社会历史问题自然化、把剥削关系视为自然规律,拉萨尔实际上取消了无产阶级有效反抗的一切可能,把工人降低为注定要受命运摆布的可怜玩物。在“铁的工资规律”的支配下,工人不可能具有真正的革命性,他们只是现代社会中受苦受难、等待拯救的一方。从这一理论出发,拉萨尔引申出来的首先是工人消极被动、绝对服从的唯物主义。

强调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是拉萨尔革命唯心主义的核心。在否定工人能动性的同时,拉萨尔把革命的主体性赋予了像他本人一样的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把革命的主体性赋予了他自己)。他认为,知识分子掌握着理智和科学,在纯粹客观的社会现实面前占尽优势,能够理解社会主义的内涵和意义。拉萨尔

①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马骥聪、任允正、韩延龙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1页。

② 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青载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49页。

③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编《拉萨尔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24页。

④ 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对其知识分子的身份感到无比自豪,总是向工人夸耀自己如何用“铁的工资规律”理论揭穿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骗局。他深信,知识分子对工人的领导能够实现“科学与工人”的结合,“在思想家与群众之间的鸿沟上架设桥梁”^①。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首要的,他们肩负着从外部向愚昧无知、一无所能的工人注入思想的历史重任。

在赋予知识分子以革命的主体性和领导地位的同时,拉萨尔也要求知识分子为革命承担更多责任。他相信,革命的成败取决于领导者,而不是群众。这一观点突出体现在其创作的悲剧作品《弗兰茨·冯·济金根》中。《弗兰茨·冯·济金根》讲述了一个关于革命领袖由于错误的行动纲领和没有得到民众支持,致使革命运动走向失败的故事。正如弗兰茨·梅林后来分析的那样,拉萨尔用这个故事映射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因为这个阶级在应当坚决承担起历史重任的关头只顾着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是联合无产阶级坚决推翻专制制度。借剧中人之口,拉萨尔指出“在历史的市场上,乔装并不相宜,在那儿是一片骚乱,民众只能从装束和标记上来认识您;因此您就应该从头到脚,始终大胆地在自己旗帜的颜色中显示自己。”^②他以资产阶级的前车之鉴自勉和勉励其他知识分子。在他看来,革命最要紧的事情就是领导者大胆坚毅、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口号,以争得群众的支持,而群众则不过是衬托这些叱咤风云的领导人物的背景。

从革命唯心主义出发,拉萨尔把国家建立合作社和争取直接普选权作为其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主张。他认为,建立合作社是工人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因为工人在合作社中能够获得自己的全部劳动所得,绕过“铁的工资规律”致富。但是,拉萨尔深信,工人单靠自身的力量是没有能力建立合作社的,因为贫困的工人承担不起投资工厂的巨额费用,只有借助国

家的力量才有可能建立合作社,帮助自己摆脱贫困。拉萨尔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必须成为增进全体人民福祉的工具。他秉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保守因素,认为国家是自由的体现,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当然,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并不是保障人民自由和推动实现社会主义的真正国家。拉萨尔认为,只有改造国家,才能使其成为服务工人的工具,而改造的方法就是争取直接的普选权,这是建立合作社的重要手段。他认为,有了直接的普选权,工人就能够把那些站在工人的立场上、理解工人的苦楚并且掌握了科学真理的知识分子送到国会中去制定相关的政策并驯服国家。拉萨尔认为“在国家的援助和促进下实现的自由的个体的合作社——这是工人阶级摆脱困境的唯一道路。但是怎样才能使国家实现这种干预呢?这里可以立即向你们提出一个清清楚楚的答案:这只有通过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才能实现。”^③拉萨尔特别强调工人必须建立独立的政党并争取普选权,但他的目的不是要让工人自己夺取并摧毁国家机器,而是要把他那样的知识分子送进国会中去,成为工人和社会各阶层的领导者。由此,工人群众再次沦为知识分子指点江山的沉默背景。

综上所述,对知识分子的推崇、对工人能力的鄙夷是拉萨尔的革命唯心主义及其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特质。拉萨尔关于知识分子的革命唯心主义要以关于无产阶级的消极服从的唯物主义为前提,或者说,这种关于知识分子的革命唯心主义不过是那种关于无产阶级的消极服从的唯物主义的完成和表现。因此,用革命的唯心主义支撑起来的这种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排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没有

① 同上书,第55页。

② 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38页。

③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编《拉萨尔言论》,第141页。

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是建基于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

二、罗莎·卢森堡对拉萨尔思想的改造吸收

卢森堡并没有全盘接受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思想,而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拉萨尔的社会主义观。只不过,她的批判仅仅停留在拉萨尔的具体主张上,并没有深入到他的精神内核。在写于1904年的《拉萨尔与革命》一文中,卢森堡意识到拉萨尔的主张可能会成为改良主义的理论资源,但却仍然为之辩护,认为他“把整个斗争缩减为几个战斗口号——普选权和生产合作社——并不是因为他极有耐性,想用资产阶级改良这个小勺慢慢舀尽社会主义诉求这片汪洋大海,而是因为他迫不及待地要求缩短漫长的历史进程,想集中力量向几个关键要点发起冲锋”^①。显然,卢森堡试图剥离拉萨尔社会主义思想的表面与内核,消除其中的改良主义因素,使革命唯心主义更加激进,以便将其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中。

卢森堡对拉萨尔革命唯心主义的吸收,首先体现在她对无产阶级意识的强调上。她认为,无产阶级意识的获得、思想境界的提升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决定因素”^②。她指出,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无产阶级除了要承担政治、经济任务,还要承担精神任务,发展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强调要使无产阶级意识到,眼前发生的社会变革,早就以全部科学思想的精神变革为前提。”^③对无产阶级意识重要性的强调,深深地镶嵌在她的思想体系中。由此,卢森堡提出了她的“灌输论”,即社会主义的鼓动可以将阶级觉悟灌输到工人中间,社会主义就是“把自觉的观念、有计划的思想并从而把自由意志灌输到人的社会行动中去”^④。她在纪念马克思逝世20周年的文章中重新阐

释了恩格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认为迄今为止一切阶级社会的重大缺陷就是思维与存在、意志与行动处于敌对关系,这一敌对关系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被消除。她认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社会民主党人依靠理论的力量,有幸在阶级社会依然存在之时就能够率先消除思维与存在、意志与行动的对立,一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

这样,马克思的理论就被卢森堡解读为拉萨尔版本的理智和科学,并使知识分子认为,由他们组成的党能够突破社会关系的限制。显然,当卢森堡这样看待马克思的理论时,还没有看到1932年才首次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否则,她应当会注意到,被认为已经掌握了马克思理论的这个社会民主党的处境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那个好汉十分相似。那个好汉认为,“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⑤,只要抛弃重力的思想,就能避免溺死的危险。

正如拉萨尔强调工人需要理智和科学的指引,同时又把理智和科学看作知识分子的特权那样,对于卢森堡而言,无产阶级意识的载体不是无产阶级,而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党。既然理智与科学这些意识层面的东西能够凌驾于社会关系之上,那么党在革命中就是第一位的。

在如何看待党的作用、地位等问题上,卢森堡没有像布朗基主义者那么极端。她极力反对那种认为革命能够由党的中央委员会的

① Rosa Luxemburg *Gesammelte Werke*, Band 1.2, Berlin: Dietz Verlag, 1970, p. 419.

② 彼得·胡迪斯《作为革命理论家的罗莎·卢森堡:在1905年俄国革命前后》,刘艳芳译,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5年第1期。

③ Rosa Luxemburg *Gesammelte Werke*, Band 6, Berlin: Dietz Verlag, 2014, p. 399.

④ 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0页。

一纸命令创造出来的想法,坚信社会主义革命是群众的革命,是历史上首次实现的社会中大多数人自觉行动起来推翻少数人统治的运动。面对日益官僚化、保守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卢森堡坚决捍卫群众自发性的革命力量,无情批驳那种在革命时刻试图取缔群众自发性的观点,并深刻地指出“革命使社会民主党难于对群众罢工发号施令,而且它喜怒无常,随时都会把社会民主党手里的指挥棒夺掉,或者把这根指挥棒塞到它的手里。”^①

当然,对群众自发性的重视并不妨碍卢森堡同时强调党的作用,尤其是从拉萨尔主义的角度突出党的地位。正如拉萨尔强调作为革命领导者的知识分子,必须旗帜鲜明地以革命纲领引领群众那样,卢森堡认为,对于残酷斗争给群众造成的艰苦环境和困难情况,“革命时期所提供的解决办法就在于它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伟大的理想”^②。革命理想的产生并不是一个神秘的过程,它是党对群众进行政治领导的结果:

为斗争制定口号,给斗争指出方向;在安排政治斗争的策略时,要使现有的和已经迸发、已经行动起来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每一阶段和每一时刻都有用武之地,而且要在党的战斗阵地上表现出来;要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果断和锐利方面不但永不落后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而且还要跑在它的前面,这些才是群众罢工时期的“领导”的最重要的任务。^③

由此可见,卢森堡认为,党的领导就是思想、精神的领导,就是通过党使革命意识与群众的自发行动结合起来,向群众的自发行动灌输理智、科学、理想和信念。正如拉萨尔认为知识分子要对革命的成败承担主要责任一样,卢森堡相信党的领导对群众运动而言是生死攸关的,因此她对党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她并

没有围绕工人群众的客观情况展开批判研究,而是在把工人群众神圣化的同时,将革命实践的失败归结为党的领袖没有走在群众前面,党没有适时地为群众提供正确的指导。比如,在研究1905年俄国革命时,卢森堡就认为,群众罢工的成败取决于党,“社会民主党所制定的坚定、果断和勇往直前的策略会使群众产生稳妥感,产生自信心,产生战斗热情。反之,摇摆、软弱和对无产阶级估计不足的社会民主党策略,却会使群众丧失活动能力和不知所措”^④。在反思失败的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时,卢森堡强调,虽然群众的自发行动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领导群众的党却陷入了停顿和分裂,无法坚持自己的目标,无法给群众“提出明确的口号,指导他们采取彻底的、果断的态度”^⑤。面对政党失灵的局面,卢森堡并没有怀疑党领导群众的模式和关系,也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为何不能通过自身的坚强组织和革命意志取代党的问题,而是敦促领导群众的党“不要空谈”、“不要无尽无休地讨论”、“要行动”。^⑥这样,卢森堡就把工人群众摆上了远离实际情况的神坛,解除了工人群众实现自我解放的责任,把工人的自我解放转变为党解放工人,要求党为革命承担主要责任,从而不知不觉地把党打造成革命的主体。这样,卢森堡就完成了她的革命唯心主义,同时也完成了她的消极服从的唯物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政党组织、意识形态要比无产阶级群众本身更为重要的这种革命唯心主义不只是卢森堡个人的独特想法,而是存在于整个第二国际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氛围。除了卢森堡,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也深

① 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第179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80页。

④ 同上。

⑤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68页。

⑥ 同上书,第569页。

受源自拉萨尔的这一思潮的影响。比如,考茨基在1902年发表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修正》一文中就把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意识分离开来,强调“从工人运动中不可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学说”^①,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产生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東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②。卢森堡与考茨基一样,不仅认同这种社会主义意识的产生和传播机制,而且同样认为党就是由知识分子而不是无产者组成的,强调“灌输”和“领导”只能出现在无产阶级的“外部”,是由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组成的党的责任和义务。她在考察1905年俄国革命时指出“对无产阶级群众进行启蒙、训练和组织的工作在所有其他国家都是在革命以前由资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和政治理论家承担的,而在俄国,这个工作却成了知识分子的专有任务。”^③可见,拉萨尔的革命唯心主义对考茨基和卢森堡等人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三、罗莎·卢森堡接受拉萨尔思想的原因及其面临的问题

卢森堡等第二国际理论家主动吸收拉萨尔的思想,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一方面是由于与改良主义论战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回应社会主义、特别是工人运动在当时面临的新问题。然而,从根本上说,这种思路的背后还牵涉到他们以经济决定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論缺陷。

卢森堡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看重拉萨尔的思想,首先是出于与改良主义论战的需要。卢森堡强调党的政治领导、党在思想上的绝对地位,首先就是为了反对工会对党提出的所谓“平等权利”的要求。为了遏制工会因过分关注工人阶级局部利益、当前利益而滋生蔓延的改良主义,卢森堡坚决捍卫党对工会的领导

权,认为党代表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能够用自己的科学理论引导工会摆脱“狭隘的经验主义泥潭”。^④考茨基提出“灌输论”的目的在于回应修正主义者的质疑,后者否定无产阶级意识必然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伴随无产阶级行动而到来的观点,认为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最为淡薄。无论是卢森堡还是考茨基,都乐于接受拉萨尔思想的指引,急于向改良主义者证明:工人在经验上靠近改良主义,并不能动摇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因为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党保证了阶级觉悟的可能性,并且能够将阶级意识自上而下地广泛传播。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卢森堡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看重拉萨尔的思想也是为了回应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面临的新问题。在第二国际成立的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产业工人成长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但是,在产业工人数量上升的同时,工人群众的革命性却没有显著增长。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当时正朝着帝国主义的方向前进,一方面,国家机器与资本的联合极大地压缩了激进运动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对外侵略造成了国内的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相对于激进工人运动的止步不前,由拉萨尔参与创建并奠定组织形式基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却逐渐通过政党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熬过了《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艰苦岁月,而且在国会选举中占尽优势,以至于恩格斯也由衷地赞叹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支持者将“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

① 孙来斌《“灌输论”首倡者问题再探》,载《思想理论研究》2010年第7期。

② Karl Kautsky, “Die Revision des Programmes der Sozialdemokratie in Oesterreich” *Die Neue Zeit*, Vol. 20, Band 1901/1902, Heft 3, p. 79.

③ 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第138页。

④ 同上书,第203页。

定性的‘突击队’”^①。特别是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心已经从法国移向德国,这就进一步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特有的组织和斗争形式具有了国际性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卢森堡等第二国际理论家开始思考如何把工人群众有效地组织起来并注入革命意识,在党的带领下保持和提升革命力量。他们因此汲取了拉萨尔的思想,把政党斗争看作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主要形式,强调发挥党的政治领导和意识形态作用。这种思路一直贯穿到第三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在西方和东方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都引发了关于意识形态、政党等理论主题的争论。

然而,轻易地接受拉萨尔的思想,特别是认为拉萨尔能够填补马克思的“不足”,暴露出卢森堡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一个理论缺陷,即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理解为无需无产阶级参与的纯粹自然的历史过程。这就导致了他们无法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找到关于革命的能动作用的启示,只能向曾经有力地唤醒过德国工人运动的拉萨尔求助。

经济决定论的模式在卢森堡的《国民经济学入门》一书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卢森堡在这一著作中直白地宣称,她就是按照拉萨尔的思路来理解《资本论》的。^② 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样,只是一种把资本主义经济看作自然现象、旨在说明其背后的纯粹客观规律的学说。卢森堡所理解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必然会缺失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内容,因为在其看来,资本主义的灭亡是无需人为干预的自然过程,既不需要无产阶级的自觉参与,也不包含社会主义这样的积极因素;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以及从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的自然死亡之后;无产阶级注定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斗争中获得阶级意识,其阶级意识只能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运动之外、在知识分子的头脑

中形成。由此,卢森堡把资本主义的灭亡及其理论分析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行动分离开来。

正因为有了上述这种分离,卢森堡认为,必须建立“国民经济学与现代工人阶级的特殊联系”^③。她深信,马克思的学说“是教育工人阶级的最必要的基础”,而工人则是这种学说的“唯一听众”^④,但在此时,理论与工人的有机联系早已被破坏殆尽,取而代之的只有机械的拼接。她认为,拉萨尔的思想就是搭建这种机械拼接的脚手架。在结束了关于马克思的学说如何成为国民经济学的顶峰的论述之后,卢森堡引用起拉萨尔的名言来总结国民经济学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当科学和工人阶级——社会的两极——融合无间的时候,文化上的一切障碍都将被它们的铁手所粉碎!”^⑤ 她认为,只有通过知识分子的理论灌输实现国民经济学与工人阶级的机械结合,马克思的学说才能发挥革命作用。

然而,把资本主义的灭亡及其理论分析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行动分离开来的做法,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做法既没能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立足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也没能理解贯穿于这一批判之中的辩证法机制。

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决不会把现实理解为纯粹外在的客体,而是把对象、现实“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⑥ 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从来不是单纯被动的一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每一次前进都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反抗、团结和斗争,伴随着无产阶级历史主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页。

② 参见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彭尘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0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7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

的进一步觉醒。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对象,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社会外在客观的运作机制,不如说是无产阶级的运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他们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运动和革命的学说。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无产阶级运动的现实根源、发展条件和前进方向,以及促使无产阶级发展成为历史主体和革命阶级的社会机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归结为纯粹客观的必然性的观点,显然忘记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主体,资本主义社会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走向灭亡。在无产阶级独立的自觉斗争缺席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辩证法不是单纯的否定和抽象,不是空洞的无,它竭力在旧事物的解体过程中呈现旧事物自身孕育的肯定结果。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用辩证法这一否定之否定机制支撑起来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呈现。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不是单纯地为社会主义这一结论做好准备,而是在阐述社会主义的现实内容。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彼岸,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运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解体的现实过程,同时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②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运动要去争取实现的目标,它整个地就是无产阶级运动本身。正因为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简单地理解为单纯的否定过程,看不到这一过程本身同时就是肯定的东西的产生过程,卢森堡等第二国际理论家才会急于在现

实的工人运动之外寻求意识形态,让意识形态去充当主体。可是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就不再是现实的运动,而是只剩下知识分子的神圣教条和宗派主义了。

“只要宗派有其(历史的)存在的理由,工人阶级就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③拉萨尔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的深刻影响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理论根源,它意味着宗派主义对科学理论的侵蚀,意味着与无产阶级斗争这个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相背离,意味着用其他社会阶层或某种僵死的组织形式代替无产阶级的斗争,意味着把无产阶级看作是消极等待拯救的可怜对象,而不是通过自我解放来解放社会的历史主体。然而,没有无产阶级通过自身独立的自觉行动实现的自我解放和社会解放,一切意识形态阶层或运动组织取得的辉煌胜利终究都是空中楼阁,都是虚幻的社会主义。

通过对卢森堡思想中的拉萨尔主义因素进行批判性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与拉萨尔主义的根本差异,并且认识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务之急决不是回到宗派主义和意识形态中去,而是立足当下,坚持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运动中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林浩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责任编辑 徐 焕)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7页。